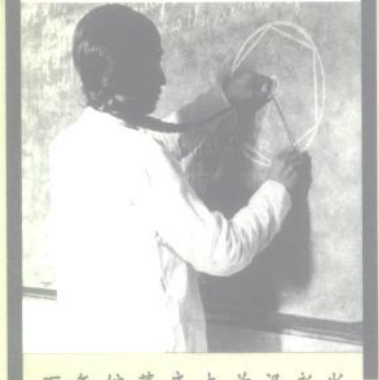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百年馆藏库本首译新版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英〕约·罗伯茨 / 编著
蒋重跃 刘林海 / 译

时 事 出 版 社

主编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英] 约·罗伯茨/编著

蒋重跃 刘林海/译

时事出版社

1971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 (英) 罗伯茨 (Roberts, J. A. G.) 著; 蒋重跃, 刘林海译.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1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ISBN 7-80009-526-6

I. 十… II. ①罗… ②蒋… ③刘… III. 社会 - 评论 - 中国 IV. 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912 号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J. A. G. Roberts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9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40 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套介绍西方的中国观的译丛,其作者有的曾在中国居留,有的是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的或以外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打量、考察着这块神秘的土地,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记录下他们的观感和惊奇,或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下有关中国学的学术专著。这些作品在西方轰动一时,而在中国却长期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们希望将本译丛发展成一套囊括西方关于中国的主要著作的大系,以填补中国出版业的空白。

这些著作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历史的侧面,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些都是极其难得的史料,可以使我们较为清晰地回眸历史的原始形貌。总的来说,这些作者对中国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如《中国乡村生活》、《中国人的特性》的作者明恩溥,是最早建议美国总统退还庚子赔款的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的作者立德夫人,是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发起人等。当然,有些对中国问题的评说有失允当,有的是出于文化上的隔膜与偏见,有的则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为其侵略行径开脱。为保持史料原貌,在编辑中未予删除,否则就不是“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而是“中国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了。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言辞不代表出版者和译者的观点,
而是谨供读者和研究人员参考,相信大家自会鉴别。

时事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序 言

戴逸

中国被西方所认识并纪之以书,大抵应从《马可·波罗游记》算起;其后的利玛窦更以“西儒”之身份撰写了多种著作,力图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欧洲汉学界充满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化的描述;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亦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华夏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的赞美这一古老文化,以为可成西方的借鉴,有的则鄙视中国,揭示其停滞不前的传统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中国观”逐渐得以形成。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抛在了后面。于是,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时代由此开始。

结束这样一段痛史,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今世的人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认识,往往仅限于教科书和一些演义化的影视文艺,而缺少更生动更真实更细致的资料作为参考。事实上,随着当年舰炮而进入中国的,还有大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等。这些人在中国居留甚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当然也有着迥异于国人的视角。他们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分别写出过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专著,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过巨大作用。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述一直湮埋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们只能从鲁迅、潘光旦等老一辈学人的引用、赞叹和批评里,隐约遥想这些著作当年的影响。

现在,一批青年学人本着重新认知和借鉴西方“中国观”,借以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历史,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目的,从库藏旧版中译出这套丛书,命之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这实在是一件

深具意义的事。从首期推出的这一套四种译著来看,这些原著都成书于清末,真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并附有大量珍贵的旧照片。总体来看,这些作者对中国还是较有感情的;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也确有贡献。具体而言,他们在中国的居留岁月里,也提出过一些友好和善意的建议,比如主张戒除鸦片,反对缠足,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以及提倡改革教育制度等。

毋庸讳言,由于文化隔膜及未能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书中难免存有一定的偏见和错觉。因此,某些仅凭粗浅的认识即信口开河妄作解人的观点,多少便带有自大张狂和民族歧视的痕迹。至于这样一些故意夸大他国族性弊端的微词非议,或者有目的地宣扬宗教思想的传教士腔调,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不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度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出版编辑这样一套译丛,有选择地引进介绍一批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观的经典著作,我以为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有利于促进国内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于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围和深度也将起重要作用。再者,书中也存有许多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即使百年之后来回顾这些意见,仍具有一定的警醒价值。如果能积累有年,持续不断地编译下去,将是一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出版工程。我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多出一些,出全一些,不企望一次性完成;同时在著作的选择方面下大功夫,争取能集萃最具经典性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审视历史,温故而知新,最终达到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警示的那样:“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主编前言

黄兴涛 杨念群

十多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它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就只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了。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

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连西方学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见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由此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这种形象变化乃是西方认识中国逐渐深化的表现,或至少是其认识中国走向深化的必经过程,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其实,我们怎样看待它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是会正视且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重视对西方汉学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是较有影响的两种。它们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著作,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的借镜。而我们这套丛书,则主要选择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民族性格等具“宏观性”而又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种著述。我们的选择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对西方人的“中国观”产生过一定影响;作者眼光独具,经历丰富,观察细腻,议论有味,总之生动可读。与此同时,丛书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西方学者对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但愿这套丛书对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西方人的中国观,能够有所裨益。

1997.12

目录

导言	19 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资料/1
第一章	马戛尔尼使团： 条约前的中国/15
第二章	政府与法律/28
第三章	宗教与科学/49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中叶的叛乱/75
第五章	社会生活/89
第六章	妇女和儿童/102
第七章	经济/117
第八章	军事/138
第九章	旅行/159
第十章	文化/171
第十一章	关于中国人的特性/188
	参考文献目录/207
	译后记/229

导言 19 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资料

18 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那些以耶稣会士的报告作为自己观点基础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这方面堪称独步。伏尔泰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他们对据说在中国存在的宗教宽容推崇备致，他们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所有这些在 18 世纪中叶法国兴起的“中国时尚”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这种崇拜在英国也引起了回应和共鸣，但是其热烈的程度却要低得多，而且还夹杂着一些敌视的言论。1719 年，英国出版了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就把中国人描写成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当时不列颠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商业上的，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体验到的种种挫折，极大地败坏了中国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1740—1744 年，安森勋爵（Lord An-

son) 作环球航行时访问了广州，他的随行牧师被中国人对来访者施展的诡计、敲诈和欺骗所震惊。

到 18 世纪末，西方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欧洲革命，与中国的关系也翻开了新的一章。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不列颠急于扩大海外市场，这个需要越来越明显。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据信，她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可是从 1760 年起，在那里的贸易却仅仅限制在南部的广州一处。1792 年，马戛尔尼伯爵 (the Earl of Macartney, 1737—1806) 率领一个使团前往中国，这次使命的主要目的是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希望获准进入中国的其他口岸。这次访问的彻底失败使人相信，中国最终将被迫改变对西方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对中国的主导观点发生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不再引用伏尔泰的赞语了，而或许会引用广州副主教约翰·格雷牧师 (the Revd John Gray) 的话了。格雷牧师是一个对中国人怀有好感的人，但是他仍这样写道：“他们的宗教是由各种迷信组成的。他们的政府在形式上或许是最易于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专制政体。”^①

从马戛尔尼使团以后，前往中国的商人、传教士、外交家和旅行家的数目开始增加，他们的作品成为本书的材料来源。他们留下的资料是丰富的。如果将官方记录、报纸和未刊资料也算在内的话，情况更是如此。这本文选并

① 格雷：《中国人民法律、时尚和习俗史》，伦敦，1878 年版，第一卷，第 16 页。

不打算做全面的介绍，它的重点将落在那些更易于得到的资料上，也就是那些已经出版的英文资料上，近年来重印的书籍将占很大比重。尽管如此，这些材料的数量仍然是非常庞大的。因此，本书使用了如下一些选择摘要的标准。

文选所收集的大部分篇幅是根据第一手资料编成的，作者们可能在所叙述的事件中起过显而易见的作用，或者在所讨论的事情上学有专长。此外，还给另外一些作者留下了一定篇幅。这些作者对中国人的认识不仅仅是基于对这个民族的知识，而且还基于它的产品。《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 刊载了一篇书评，是关于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Staunton, 1737—1801) 有关《中国刑法》一书的评论，这篇文章这样写道：

旅行家的作品，即使其真实性无可怀疑之处，几乎都带有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感情色彩；而且，在讨论中凡是表现出激情或争论之处，都会使准确性和评价的公正性受到影响，从而无法满足人们求真的愿望。然而，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①

本书的绝大部分篇章选自那些为出版而写作的书籍，但是我们也摘录了一些日记和信件，这些材料提供了更多的关于中国人的私人观点。例如曾经做过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 1835—1911)

① 《大清律例》，载《爱丁堡评论》1810年第16期，第477页。

留下了他的私人日记，日记中有些曾被他毁掉了。其他人也有日记，如马戛尔尼勋爵，额尔金伯爵（Lord,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 James Bruce, 1811—1863）和“常胜军”指挥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等。在信件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马根济牧师（the Revd 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88），他曾每隔两周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想通过他的信件向那些未曾到过中国的亲友描述这个国家，这个目的使他的写作范围大大拓宽。

西方的材料可以说既包含了有关中国的叙述，又带有西方对 19 世纪的中国及其人民的态度，这两方面的信息都是有价值的。然而问题是：本书所选的材料其价值究竟何在？外国评论者可能比当地作家更客观。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可能因缺乏相应的训练，成为不可靠的目击者。似乎像是为了回答这种责难，许多作者都力图证明自己的资格。

谁的观点最值得注意？对那些多年居住在中国沿海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时间的长短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许多作者在其作品的前言中都强调这一点。美魏茶牧师（the Revd 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 14 年”，斯卡思（J.R. Scarth）给自己的书题名叫做《在中国的十二年》，科勃尔德牧师（the Revd R.H. Cobbold）自称他在宁波口岸的中国人中间生活了八年，而且“经常有机会在浙江省内旅行”^①，并以此作为自己写作的资格。

① 科勃尔德：《中国人的画》，伦敦，1860 年版，《前言》第 3 页。

特别是那些学过中文的人，往往声称自己是中国问题专家：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有资格和能力告诉人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强调为领事机构培训翻译的重要性，指出“在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之外，再加上五年扎实的训练”，对于造就一个“合格的译员”是必要的。在谈到一位投身于有关中国事务的写作而自己又不懂中文的作者时，他表达了下述观点：

……我们看到了一本为出版界注意的新书——《中国印象：当前的革命，其进展及前景》，作者是被起义者占领时赫尔墨斯号的费时本舰长（Captain Fishbouine）。文翰爵士（Sir Damuel John Bonham, 1803—1863）到南京时曾乘坐过这艘船。我们希望在作出结论前看到这本书，但是同时……我们断定它恰巧成为我们的观点的对立面：我们必须将这种可笑的例子告诉翻译家们，这个事例表明一个由于不学习语言而产生的恶果。它告诉人们，一个人试图对仅仅一知半解的事情作最真实报道所产生的谬见和误解，对于一个思想早已定型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可避免要犯的错误。而对这位既不了解那些人民，又不懂他们的语言，闭门造车，写出关于“中国——它的革命、进展和前途”的人来说，情况更糟。在此，我们再一次毫不迟疑地断定，不懂中国语言，就这个例子而言，将无助于纠正这位勇敢的舰长所犯的错误，或以任何方式矫正《观察家》（the Spectator）所谓的“一个追求个人喜好的狂妄之